

# 中國教會脈絡中的剛恆毅樞機

陳方中

## 一、前言

閱讀這篇文章的人應該大致瞭解剛恆毅樞機主教的生平及偉大事業，即使不瞭解，大概也可以從其他文章了解。另外我不能算是一位剛恆毅的研究者，我所能掌握的資料，絕大多數也就是剛恆毅的回憶錄而已，因此我不打算也沒有能力用一種考據的方式，說出大家所不認識的剛恆毅，所以這篇文章大概不會使人驚喜。不過在一種粗淺的研究近代中國天主教史的輪廓中，我已經把剛恆毅放在中國天主教架構中的一個位置，這篇文章首先就是在描述這個架構，並說明剛恆毅所處的位置。

在這個位置上，通常大家所描述的剛恆毅，多半集中在他擔任宗座駐華代表的時期，特別是六位中國籍主教由教宗祝聖，召開全中國教務會議，設立輔仁大學等。但回到歐洲的剛恆毅似乎重要性就大大降低了，他仍有貢獻，但只是擔任傳信部秘書長，是教廷傳教工作的重僚而已。這樣的看法有問題，從天主的眼光看，只要是為天主服務，價值都一樣。即使是從人的角度看，剛恆毅只是有意的隱藏自己，實際上仍做了不少大事。這篇文章的第二個部份，是探討在此架構下剛恆毅回歐的原因。第三個部份則以剛恆毅處理中國禮儀問題為例，說明他對中國教會的重大貢獻。

## 二、中國天主教架構

### (一) 歷史發展的過程

1583年利瑪竇進入中國，代表的是葡萄牙保教權之下的耶穌會士，來中國傳福音。這種關係一直到1773年耶穌會被撤廢為止，都是中國天主教史中的重要結構。西班牙道明會和方濟會在1633年到福建傳教，代表的是西班牙保教權和葡萄牙保教權在中國的對抗。教廷受夠了保教權，先在1622年成立了傳信部，準備自己主導傳教工作，但傳信部直到1659年才任命了一批法國神父為宗座代牧，來東亞傳教，縮小葡萄牙保教權管轄的南京教區及北京教區，然後在中國各省設立宗座代牧區。以後傳信部又直接派遣義大利籍的方濟會士、遣使會士以及聖家書院的傳教士。法國國王也在1682年派遣耶穌會士來華，形成了中國天主教傳教史上的複雜結構。

在這種結構中法國耶穌會士與葡萄牙耶穌會士是不一定同心合意的，因為法國耶穌會士不向葡萄牙國王效忠。耶穌會士、道明會士是不贊同宗座代牧制度

的，因為他們在服從的對象上會產生混淆。耶穌會士也經常會和道明會士發生衝突，一方面是因為傳教方法上的爭議，另一方面是西葡保教權的對立。說來複雜，其實可以分成三個元素：修會、國家、教廷。修會有自己的立場，國家考慮自己的利益，教廷在這資訊不夠發達的時代，弄不清中國真正的狀況。

清朝的第三個皇帝雍正即位後（1723年），中國進入禁教時期。已經因為禮儀之爭元氣大傷的天主教，又受禁教影響，進入非常蕭條的時期。原先為傳信部服務的法國神父組成了巴黎外方傳教會，在中國佔據了龐大的傳教空間，傳教團體的優先超過了教廷。義大利方濟會情況類似，他們修會傳教士的身份也取代了傳信部傳教士。1773年耶穌會被撤廢，取代他們的是法葡兩國的遣使會士。西班牙玫瑰省道明會士對福建不放棄的經營，獲得了教廷的肯定。發展至此大勢逐漸底定，每個傳教團體都有其地盤，教廷任命這個修會的會士擔任這個傳教區的宗座代牧。當然葡萄牙保教權乃在做微弱的抵抗，但這個抵抗到1856年完全告終，教廷將全中國都改為宗座代牧區，取消了南京教區及北京教區。也有修會不願由會士擔任主教，重回中國的新耶穌會就是如此，但他們很快就因會長與代牧主教職權的衝突，選擇接受這種制度。

十九世紀後期新入中國傳教比利時聖母聖心會、米蘭外方傳教會、德國的聖言會也都按此模式傳教。聖母聖心會在內蒙古、米蘭外方傳教會在河南、聖言會在山東南部。趨於簡單的情勢仍可分為三個元素：修會、國家、教廷。修會仍有自己的看法，國家仍顧自己的利益，但現在十九世紀半教會與歐陸國家的衝突趨緩，在一地區傳教的傳教團體又皆為同一國籍，十九世紀又是民族主義昂揚的時期，這些外籍傳教士除了傳教的熱誠外，擁有愛國心，有機會時為其祖國服務，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前面提到的是外國傳教士，那本地的神職人員呢？在中國，本地神職人員出現在十七世紀下半葉，十八世紀開始逐漸增加，他們中只有第一位中國神父羅文藻，曾被任命為主教。但那只是一個特別的孤例，在一個以外國傳教士為主的教會中，基本上本地神職只是助手而已。特別是在十九、二十世紀，在歐洲傳教士種族優越感的心理影響下，那些要爭取平等待遇的中國神職，可能在修士階段就被踢出了修會大門，通常理由是不夠謙遜，不夠服從。所以中國神職們不是下一階段的主角，必須要有人從外面去打破這一根深蒂固的結構。

## （二）中國天主教的本地化運動

1. 雷鳴遠（Vincent Lebbe）：他是遣使會的傳教士，1901年來到中國傳教，但他在比利時人的背景，十九世紀後期教會新思想的影響下，開始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他提出的問題是：為什麼中國天主教徒不能愛自己的國家？十九世紀以後，遣使會士絕大多數來自法國，法國和中國政府簽訂條約保護傳教，因此在遇到傳教糾紛時，傳教士習慣法國政府外交人員的協助。法國強而中國弱，久而久之，中國政府遂將天主教徒，乃至於所有基督徒視為化外之民。每個地方的教堂

就代表外國勢力，象徵物就是在教堂上飄揚的法國國旗。法國如此，德國也起而效尤，義大利、比利時也都一樣。天主教如此，基督新教的英美國旗也在其教堂上方飄揚，試想：這是一個多不協調的畫面。所以雷鳴遠從反省歐洲傳教士過度民族主義立場出發，提倡中國的教友愛國。

2. 馬相伯與英斂之：馬相伯（1840~1939），曾經是一名耶穌會士，後離開教會。在離開教會期間，成爲一名間接參與外交的人員。他在 1898 年回到教會，將財產捐給耶穌會，興辦了震旦學院。然後又辦了復旦學院（現在上海復旦大學的前身）。在他的生命歷程中，對於法國傳教士的種族意識是深有體會的。

英斂之（1867~1926），其實是姓愛新覺羅，英是他的漢姓。雖然身爲皇族後裔，但他的前半生只是一個落魄貴族。然後在一些企業家的支持下，他於 1901 年在天津設立了「大公報」，這是一份在二十世紀中國最具有影響力的報紙。擔任社長，負責撰寫社論的英斂之，也就漸漸成爲知識分子的領袖。

馬相伯和英斂之都是教友，是當時教友群中少數的知識分子。他們在社會上的聲望使他們有說話的分量，而且也較不受教會體制的約束。他們都贊成雷鳴遠教友愛國的想法；此外，他們更關心教友的品質、教會培養國籍神人員的品質。他們不能接受遣使會不重視教育的態度，認爲應該要在中國設立天主教大學。

雷鳴遠、馬相伯和英斂之共同構成了一種相連結的思想：教友愛國；提升教友品質；提升中國籍神職人員品質；建立中國天主教大學；建立一個正常的中國教會，最需要的就是中國籍主教。

### 3. 發展與挫折

雷鳴遠在以後的回憶中，稱 1905 年到 1916 年這一段時間爲「天津運動」。他與英斂之當時都在天津，以「大公報」報館爲基地，他們積極參與社會，也歷經了中國的改朝換代。

1912 年馬相伯和英斂之聯合向教宗上書，請求在中國華北地區，最好是在北京設立大學。教宗一時沒有回應，英斂之在他住的地方—香山靜宜園，設立一所專爲天主教青年辦的學校，稱爲「輔仁社」。1915 年，雷鳴遠用他回歐募得的經費，在天津開辦了「益世報」，很快也有了很好的銷路。但他們與歐洲傳教士在教友愛國立場上的差別，以及與此相關，中國教友不願屬於次等階段的想法，都一再的引發歐洲傳教士的不滿。

雙方正式的衝突是「老西開事件」，在天津的老西開，法國政府在 1915 年開始嘗試將法國租界擴展到此，雷鳴遠創辦的益世報創刊未久，即曾公開抨擊此事。1916 年法租界當局展開佔領行動，雷鳴遠站在中國百姓這邊，帶頭抗議。雷鳴遠先是被天津主教送出天津代牧區，1917 年 3 月，雷鳴遠被遣使會調到浙江省嘉興。中國幅員廣大，方言眾多，嘉興方言是雷鳴遠完全聽不懂的，如何傳教？

雷鳴遠在符合教會法的原則下並不屈服，將中國天主教的情形向羅馬上訴。

在飽受歐洲傳教士攻擊的情況下，英斂之爆發了。他在 1917 年寫了一篇轟動教會的〈勸學罪言〉，連同〈覆友人駁勸學罪言書〉，出版發行。內容主要就是針對外國傳教士不尊重中國文化，不好好教育中國神職，大加批評。在外國傳教士當道的情形下，這本不到一萬字的小冊子，很快就成了教會禁書。但羅馬方面也收到了這本小冊的複本。

自 1860 年中法簽訂北京條約後，法國就藉口條約，聲稱在中國擁有保護傳教的權力。教廷在法國保教權的干擾下，不能和中國政府建立外交關係。在第一次大戰後期，法德正進行殊死戰的時候，教廷在其機關報《羅馬觀察報》上公佈了即將和中國建交的消息。即使已到公佈消息的階段，法國當時與教廷也無邦交，法國因戰爭情勢如此嚴峻，法國仍斷然的、公開的反對教廷與中國建交。在國際壓力下，中國暫停了與教廷換使的計劃。

### （三）剛恆毅的位置

前述就是剛恆毅來到中國前的背景。看似複雜，其實也可分成幾個部份：外籍傳教士、外籍傳教士所屬的政府、中國教友、教廷，以及在各種因素影響下的中國教會。不能說外籍傳教士心中沒有天主，他們仍是傳福音的人，但在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期，這個充滿民族主義熱情的年代，不少外籍傳教士和其祖國之間有太過密切的關係。中國教會部份先知先覺者，也同樣受民族主義影響，認為中國教友應認同自己的國家，接受自己的文化，主導自己的教會。教廷接收到中國教會的訊息，多次派遣調查人員清查中國教會實況，而且再一次嚐到法國政府的厲害。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教宗本篤十五世就發表人〈夫至大通諭〉，此通諭中雖未明言，但主要就是針對中國教會現況，要傳教士好好反省，是否把其祖國放在天國之前？是否忽略了培植本地神職人員的重要？是否視其傳教區為地盤，緊抓著不放？是否傳教士不重視本地文化，不深入學習當地語言？

這樣就應該很容易了解，為什麼會挑選一位沒有外交經歷的人，為什麼要用教宗代表的身份。剛恆毅是沒有什麼可被法國挑剔的對象，即使如此，顧慮最壞的情況，剛恆毅的行動必須保持秘密和低調。以〈夫至大通諭〉為基礎，剛恆毅的使命很清楚：召開全中國的教務會議，是宣示教廷直接主導中國教會，反過來說就是和法國保教權宣戰。設法任命中國主教，是建立健全中國教會的關鍵步驟，反過來說也是糾正中國教會長期不正常的現象。在北京設立一所天主教大學，是代表對中國文化的尊重，也代表可以在中國文化中建立基督信仰。如果這些外籍傳教士仍然消極抵抗，不願改變他們培育本地神職的方法及態度，在羅馬設立傳信大學，然後要求各代牧區主教遣派優秀修生至此攻讀，也就成了適當的方法。

在這個結構中，必須清楚了解，剛恆毅是教廷的代表，是教廷政策的執行者。不是他個人同情中國教會的處境，而是教廷要藉著他改變中國教會的處境。所以他不是外國傳教士的敵人，他是要改變某些外國傳教士，習以為常和其母國政府過於接近的態度。他是中國教會的朋友，但如果某些國籍神父或教友，將其世間之祖國，視之超過天國，他也是不會贊成的。教宗的通諭為外國人適用，為中國人也適用。

所以剛恆毅在「愛國」這一點上的立場如何？應該這麼說，他認為任何人都都有愛國的權利，但這畢竟是屬於世界的範圍，一個基督徒的終極目標是尋求天國。外國傳教士不准中國神職及教友愛其祖國是錯的，但中國神職或教友，特別是神職人員，也應謹記他的第一優先是天國。因此他對他的主徒會士說：「假若有一個主徒會士，把自己修會的利益，或把那些屬於其本國的利益，放在教會的至高利益之上的，他就出賣了自己的聖召。<sup>1</sup>」適用於主徒會的，當然也適用於整個中國教會。

原則雖然清楚，但在實際運用上，有很多地方仍需剛恆毅自行判斷。首先在藝術方面，這是剛恆毅的強項，他很清楚在建築式樣及繪畫等，採用中國元素是理所當然的，這一點，歐洲傳教士沒有什麼意見，畢竟基督信仰來自西亞，而我們所習見的藝術品都是歐洲化的，因此創造一些中國式聖像及教堂，也是無可厚非的。但在敏感的政治問題上，歐洲傳教士，特別是法國傳教士，則可以在剛恆毅具有政治意涵的行動中，找到可批評之處。他們的批評主要就是：剛恆毅不中立，偏離了他應有的位置。

### 三、對剛恆毅的攻擊及其離筆

首先，擔任宗座駐華代表的剛恆毅，他的身份就足以成為支持法國保教權部份外籍傳教士反對的理由。其後，他抵華後一步步剝除法蘭西在華保教權的作為，當然更會引起這部份外籍傳教士的反感；法國政府對他自然也不抱好感，於是各種抨擊、抵制或對抗的作為遂因應而生。

這些對抗的作為開始時只是耳語，但隨著剛恆毅日益增加的行動，在籌備輔仁大學的時候，北京的助理主教富成功尋求法國政府的支持，邀請法籍道明會士，在北京籌備一所屬於法國政府管理的學校，這是一個和北京公教大學對抗的行動。這所「道明學校」在一九二八年九月開學，但不久後就在盛行的學潮中，被學生們嗅出了帝國主義的味道，被迫關門大吉。輔仁大學當時亦受波及，被稱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但靠著教宗的八一通電，輔大的學生澄清了外界的

---

<sup>1</sup> 剛恆毅〈基督及傳教士的誘惑〉《請穿起天主的戎裝》，頁 140，（台北：天主教主徒會 1976 年 10 月出版）。

抨擊，也肯定了自己。<sup>2</sup>

一九二九年一月，剛恆毅微服拜訪南京國民政府的舉動，按照剛恆毅的評斷，引發了法國駐華使館、法文報紙以及部分法籍傳教士的不安。二月六日法文的《上海日報》用諷刺的語調說剛恆毅「對越不值得信任之人而越去信任他們」，說剛恆毅的行動錯誤百出，而「這正是義大利人所有的技巧與天真。」而若這樣的政策繼續下去，「最近這幾年的事件已經清楚顯示，他們（按：指傳教士）幕後沒有強有力的支持（按：指保教權），傳教事業已變成了什麼樣子。<sup>3</sup>」

二月二十六日法國公使德馬爾德耳（de Martel）訪問寧波代牧區，寧波主教戴安德（Andrew Defebvre）在致詞時說，由於公使的來臨，「又一次證明祖國關心我們的利益，因為在中國，法國有許多天主教的事業，不斷而慷慨地給予我們協助與福利，也對我們保證為人與財產，提供為傳教工作不可或缺的安定。」法國公使的答詞說戴安德代表了法國傳教士的典範，「您知道如何把傳教士和愛國者結合在一起，因為曾對天主教傳教事業有過卓越貢獻的保教權，最近成為爭執的對象。」「是的，保教權仍安然無恙，我鄭重地向你們保證，當我擔任法蘭西共和國駐華的代表一天，我將盡全力維護這保教權所有的效力，……<sup>4</sup>」剛恆毅將此視為法國公使對他的示威。

一九三〇年三月，對剛恆毅最嚴重的攻擊，由法文的《北京日報》（*Journal de Pékin*）發動，從三月二十日至六月十二日，不斷發出各種批評剛恆毅的言論：「宗座駐華代表已經達成了他摧毀傳教事業的目的。」「教廷受一位義大利籍總主教的影响，用盡辦法，要從我們的傳教士手中奪走教區而轉給中國主教。」「他所致力政策，甚至不是要中國教友去研讀三民主義，在講授要理問答時，不是要加上孫文思想的條文嗎？」「未來中國神職的領袖已經有了（按：指陸徵祥），根據教宗的希望，他已注定將成為天主教的領袖。」「梵蒂岡與其代表所玩的把戲為中國天主教是不吉利的，本地神職的觀念根本就是謬論。」「有關教廷的最近通電，全是出自習於幻想的剛總主教之手。<sup>5</sup>」

教廷機關報《羅馬觀察報》在六月二十九日公佈了一個官方聲明，聲言剛恆毅的行動是受傳信部准許的，教宗的通電出自教宗之手。<sup>6</sup>但剛恆毅卻隱然感受到似乎有一種不利的氣氛。剛恆毅在回憶錄中並未透露那些徵象使他感受到這種

<sup>2</sup> 剛恆毅《在中國耕耘》下，頁 44~51。

<sup>3</sup> 同前，頁 90。

<sup>4</sup> 同前，頁 93~94。

<sup>5</sup> 同前，頁 209~214。

<sup>6</sup> 同前，頁 214。教宗在 1928 年 8 月 1 日致電國民政府，表示承認合法的政府，並要中國的天主教會予以尊重及服務。

氣氛，但可以推測剛恆毅會問：為什麼這個素來被視為與法國使館聯繫密切的《北京日報》，會持續的以駐華宗座代表為目標？在他的背後是否已經有所佈置？然後當剛恆毅向教廷報告時，教廷可能答覆較含糊不清，或是延遲答覆，剛恆毅會再問，這些外籍傳教士報告了什麼？

從《北京日報》透露出的訊息，可以推測外籍傳教士當時對剛恆毅的批評，大概集中在三個方面：首先，對中國政府不夠強硬，以致現在傳教士被搶、被擄甚至被殺的案件層出不窮；其次，在講授三民主義的問題上對國民政府讓步，破壞了教會學校教育內容的獨立自主；最後，剛恆毅協助本地神職搶了傳教士數百年辛苦經營的傳教區。在這些問題上，教廷對他的支持不如以往。而教廷對他支持減少或趨於審慎，可能的原因是教廷國務卿換人，原來最支持剛恆毅的加斯巴力樞機年老退休，由柏徹里（Eugenio Pacelli）樞機繼任。柏徹里是教廷的專業外交官，原擔任教廷駐德大使，在一九三〇年接任國務卿時，教廷與義國剛簽訂拉特朗條約，義國境內法西斯勢力日漸增長，歐洲各國普遍受經濟大蕭條影響，因此柏徹里在外交上的優先是歐洲，一個在中國飽受攻擊的宗座代表，是可能破壞教廷與法國關係的原因。或許因為如此，在中國問題的處理上，教廷的反應就顯得較為慎重了。

剛恆毅寫道：「由於不少人反對我，使我不得不要求傳信部長准我返回義大利。」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六日，剛恆毅離開北京，經香港轉回義大利。他當時的心情是：「目前由於很多動機使我不知是否我的任務就此結束？抑將還要回來繼續這工作？」<sup>7</sup>十二月二十日的深夜剛恆毅搭乘的輪船抵達了義大利布林地西（Brindisi）港，隨即接到國務卿電報，要他立即趕到羅馬。剛恆毅認為柏徹里樞機必定有重要的事告訴他。

十二月二十二日早上，柏徹里樞機接見了剛恆毅，剛恆毅問及在中國散佈的謠言，「他回答說法國大使並未在聖座前表示我在中國是位不受歡迎的人。他給我打電報要我到他那裡，所要談的事，是有關中國大力消除煙毒的問題。」<sup>8</sup>這個答案間接表示了新任國務卿，如前任加斯巴力樞機一樣，是支持剛恆毅中國政策的，所以不用特別談什麼。接著在同一天，剛恆毅見了傳信部長王老松樞機，剛恆毅說：「他明確告訴我，在中國應當繼續已敞開的途徑。」然後十二月二十三日，剛恆毅晉見教宗庇護十一世，「當我敘述某些謠言教廷有意在中國改變傳教方針時，教宗立刻直起胸膛，清晰且斬釘截鐵地對我說：『要知道開倒車不是

<sup>7</sup> 《剛恆毅樞機回憶錄－在中國耕耘》下，頁 251。

<sup>8</sup> 柏徹里的談話，代表剛恆毅曾向其表示過，懷疑法國大使在教宗前批評剛恆毅在中國的政策。

我的作風。』<sup>9</sup>」

從剛恆毅的回憶中，他似乎從教廷得到了充分的支持；不過他這趟回來在義大利共待了六個月，當然他要拜訪友人，回家鄉探親等，但他一定也花了不少時間用來解釋和澄清中國的現況和問題。在他的回憶錄中，他這一段在義大利的時間幾乎空白，足以反證其中必定有部份不足外人道之處。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日，他搭船經過美國，拜訪了那裡的天主教會，在八月十七日返抵北平。

這時剛恆毅的身體狀況一直不好，在美國時他開刀割除了左腋下的一個腫瘤。從美國回到北京後，右腿又生了兩個腫瘤，割除後又罹患靜脈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開始臥病，至一九三三年一月仍未好轉，於是向教廷申請返國休養。二月一日，剛恆毅艱難的離開北京，到上海後又臥床不起，二月九日被抬上返歐的郵輪，他當時設想離開或許是暫時的，但實際上剛恆毅結束了駐華宗座代表的工作。

#### 四、剛恆毅與中國禮儀問題

在剛恆毅仍然擔任駐華宗座代表的時期，他已經必須處理棘手的禮儀問題。禮儀問題是 17 世紀到 18 世紀百年間在中國傳教士間的重大爭執，主要集中在對「天」、「上帝」等名詞的看法，以及祭祖祀孔是否涉及崇拜偶像的問題。教宗克來蒙 11 世（Clement XI）在 1704 年發佈詔書，認定中國禮儀涉及迷信，禁止中國教友行使。以後在 1714 年及 1742 年教宗均曾下令禁止。因此 18 世紀以後的中國教會，對於禮儀是很敏感的，大致上呈現出完全禁止的趨勢，也就是不准許教友參加非天主教的喪禮、祭禮甚至公共禮儀。

國民政府以國民革命為號召，而國民革命的基礎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在此一新成立的國家教育體系中，教會學校立即面臨了對國父孫中山的敬禮，以及教授三民主義的問題。某位代牧主教（疑為上海）認為在他的學校裡向國父遺像行禮有迷信之嫌，於是剛恆毅發函教廷，表明他對此事的看法：

中華民國的創立者已成為一個象徵；……他的肖像在所有公共場所懸掛，正如我們（義大利人）懸掛我們國王的肖像一樣。……

僥倖在孫中山先生的書中與行動中，不曾發現有攻擊教會的地方，在其《三民主義》一書中，甚至不曾提過傳教士三字。孫逸仙是位基督徒，生活嚴肅，僅晚年曾離婚另娶，可謂是其一生中的些微瑕疵。

---

<sup>9</sup> 同前，頁 271~272。



我已讀過《三民主義》的法文翻譯本。我以為其中僅有少數主張似乎不太正確，而以天主教的社會原則加以更正就是了。

教宗的八一通電已為我們打開了一條坦途；承認中華民族合理的要求，孫文學說中凡是好的我們接受，錯誤的加以修正或拒絕。<sup>10</sup>

國父 孫中山去世後，他的靈柩暫厝於北京香山的白雲寺。國民政府形式上的統一中國後，為孫中山舉辦國葬大典，在南京營造了中山陵，並邀請各國公使前來參加。在外交意義上，十八國使節的參加象徵了列強各國不再觀望，真正的將國民政府視為代表中國的政府。教宗代表在使節團之外，但也在國民政府邀請之列，因為教宗首發的八一通電，對各國陸續承認國民政府有推波助瀾的功效，國民政府對此是抱持好感的。<sup>11</sup>

這個奉安禮儀是完全社會性的，不致造成宗座代表的不便，因此教廷同意接受邀請，並命剛恆毅以教廷特使的身份參加。不過剛恆毅還是先聲明只參加社會性的儀式，不參加任何宗教性的儀式；此外也聲明其參與並不代表完全贊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這些聲明是備而不用，主要是基於剛恆毅宗座代表身份的敏感。

六月一日清晨，奉安大典開始，剛恆毅對整個典禮有極佳的評價，他認為他參加這個奉安大典意義深長，他說：

三年前中國革命中了共產黨的惡毒，曾高聲疾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被目為帝國主義工具的基督宗教。今日天主教的自由與獨立被中國政府承認與維護。在慶祝愛國運動勝利的行列中—國父奉安大典—教會佔有一個榮譽的席位。……

同時也創下歷史的新例。……因為這個奉安大典完全拋棄了所有迷信的色彩，而以莊嚴肅穆純社會性的儀式舉辦。……總而言之，中山先生的葬禮完全是一種新的儀式，一種真的革命，與中國認為古老神聖，牢不可破的習俗相背。<sup>12</sup>

既然是一個社會禮儀，當各國公使都在中山先生靈柩前行三鞠躬禮時，剛恆毅當機立斷，也在中山先生靈柩前行三鞠躬禮致敬。<sup>13</sup>懂得中國天主教歷史的

<sup>10</sup> 《剛恆毅樞機回憶錄—在中國耕耘》上，頁 70。

<sup>11</sup> 同前，頁 113。

<sup>12</sup> 同前，頁 116。

<sup>13</sup> 同前。

人都可以想到，這是和禮儀禁令相反的舉動，也是日後廢除祭祖祀孔禁令的預像。

剛恆毅回歐後不久，也碰到了東亞類似環境中的禮儀問題。首先是偽滿政府宣傳以儒家的「王道」治國，因此在學校中必須實施敬孔祭祖的儀式。若東北的教會學校不同意實施此儀式，政府將關閉這些教會學校。關於這個問題，吉林宗座代牧高德惠（August-Ernest Gaspais）主教，被教廷任命為代表，與偽滿當局交涉，經過一段時間的意見交換，得到偽滿官員的明確答覆，稱在學校中實施的敬孔儀式，純粹是表示尊敬之意，不具有宗教性質。《羅馬觀察報》在 1935 年 6 月，刊登了教廷批准在滿洲實施社會性敬孔祭祖儀式的消息，解除了東北教會學校的關門危機。

其實在 17 世紀的禮儀問題中，爭論焦點就是對同樣或類似禮儀，在認知上究竟是宗教性或社會性？剛恆毅在三民主義或國家的奉安大典上，基本上即是確定其社會性，不與基督信仰衝突即可實施。偽滿的祭祖祀孔問題，也是按照同樣的想法處理。

既然在東北可以實施祭祖敬孔的儀式，那在日本的國家禮儀—神社敬禮，以及最根本的關於在全中國祭祖敬孔的儀式，應該如何一體加以看待？一九三五年十月，剛恆毅在此等事上已有了明確的原則。他說：「在這思想和社會組織起了驚人的改革時，如果關於某些行動，本來無關緊要的，有了政府當局一個正式的聲名，宣佈這些行動純然是屬於民間的非宗教的儀式，那麼我們就不當堅持那些都是久成習俗的觀念，以及宗教殘餘的行動。<sup>14</sup>」當時剛恆毅尚未接任傳信部的秘書長。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剛恆毅接任傳信部秘書長後，即以此種原則處理日本的神社敬禮及私人的喪葬禮儀。「那些經常在由政府主管的神社紀念堂裡舉行的儀式，已由政府當局（如已多次明白的聲言所示），以及一般的知識份子，認為純係愛國的表示，……所以天主教徒可以參加。……必要時，聲明自己的用意，以免曲解了他們的行動」「……也可以准許信徒們，在參加喪葬、結婚，以及其他在日本的社會生活裡，……參加所有那些儀式，雖然它們起源於迷信，可是由於人地方面的種種情形，以及現在一般人的看法，不復含有迷信的意義，而只表示禮貌與友愛。<sup>15</sup>」

有關中國的禮儀問題，則是上述問題的根本與來源，東北及日本問題的解決，可說為中國禮儀問題的解決奠定了基礎。因此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八日，教

<sup>14</sup> 《剛恆毅樞機回憶錄—零落孤葉》，頁 174。

<sup>15</sup> 同前，頁 197~198。

廷傳信部發佈命令，將以往禁行中國禮儀的命令，加以廢除，理由是：

- (1) 中國政府已經反覆地和公開地說明：所有的人有自由選擇他們願意信奉的宗教。政府無意在宗教問題上發布法律和命令。因此，公共當局任何表演的或規定的尊孔儀式的履行，都不含有宗教崇拜的性質，而是為了這樣的目的：即培養和表達對一位著名的偉大人物的適當的崇敬以及對祖先的傳統應有的尊重。由此，天主教徒可以在孔子的肖像和牌位前，為敬奉他而造成的建築物裡或學校裡，出席尊孔的儀式。
- (2) 在當局要求這樣做的情況下，天主教學校懸掛孔子肖像，甚至樹立刻有他名字的牌位，或者鞠躬致敬，都不應禁止。如果有壞表樣，應當明確地表明正確的天主教意願。
- (3) 如果信天主教的教師和學生被命令出席帶有迷信表徵的公共禮儀，根據法典一二五八條款的指示，只要他們保持消極的態度，就可以參加。他們所做出的尊崇應被視為僅僅是民間性。有時，出於避免對其行為的錯誤解釋的需要，他們應該陳述上面的話，使他們的意向昭著於世。
- (4) 在亡者或其畫像前，甚至在刻有亡者姓名而別無其他內容牌位前，鞠躬或行其他民間性的敬禮，都應該被認為允許的和適當的。

以後的教會人士追念中國禮儀的解禁時，都稱 1939 年這道傳信部部令是一個劃時代的成就，雖然剛恆毅沒有明說，但以他當時的位置，此件部令由其主導殆無疑義。關鍵性是對的，但其影響是逐漸而局部的。就逐漸來說，此處舉一小例；杜寶田神父 1950 年代初在羅馬，見其兄杜寶晉蒙席向一路過馬車所載棺木脫帽致敬，以禮儀為由責問其兄。<sup>16</sup>此可見這道 1939 年的部令，並未影響 1950 年前的中國教會，實際上也未影響 1950 年後中國教會，中國教友們迄今是不奉香祭祖的。

局部的意涵也是如此，所謂中國禮儀的實施只在台灣。1971 年于斌樞機主教，開始在社會上及教會內再提倡祭祖。<sup>17</sup>然後台灣地區主教團開始設置教堂中的祖先牌位，在農曆新年的彌撒中，按照中國人的傳統共同祭祖拜年。許多教友家庭開始設置祖先牌位；在台北復校的輔仁大學，每年四月清明節前，也會舉行祭天敬祖典禮。當然必須說明清楚，這些典禮儀式都是社會性的。

---

<sup>16</sup> 杜寶田〈憶長兄〉《杜主教逝世週年追思文集》（新竹：天主教新竹教區，1987 年 6 月印行），無頁數。

<sup>17</sup> 陳方中《于斌樞機傳》（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1 年 4 月初版），頁 292。

中國政府支持的本地化教會，其實一直都在這種尊重多元的態度中缺席，或許是以後改革的可能方向。

## 五、結語

在中國教會的脈絡中，在外國傳教士、教廷、中國神職及教友的架構中，剛恆毅是清楚的站在教廷代表的位置上，但是部份外籍傳教士質疑剛恆毅偏袒中國。應該這麼說，剛恆毅沒有偏袒中國，是教廷偏袒中國，沒有領土及國家利益的教廷，比那些受到世俗影響的傳教士，更能了解中國教會的困境，以及必須採取何種方法改革。在教廷結構中對剛恆毅的批評，應該說教廷也是人的組織，由人組成的教會如何都不是完美的。當然剛恆毅也會犯錯，但從我個人主觀的判斷，絕大部份時候，剛恆毅的所言所行，都恰如其份。

如果把剛恆毅放在一連串二十世紀中國天主教的人物名單中，剛恆毅是在那些互相影響的人物中，不可缺乏的角色。從 1922 年到 1958 年，這些重要的人物，不論其立場為何，都與剛恆毅有過來往，那些代表中國教會的人物，都對剛恆毅抱持著尊敬的態度。他也一直維持高度，很有技巧的，很有原則的，對中國教會提供協助。

我個人認為，廢除中國禮儀禁令，是他給中國教會最好的禮物。而這禮物在現在及未來，仍可對中國教會有所幫助。